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陈佳

(莆田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摘要]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关键词]意识形态;操纵;天堂蒜薹之歌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6.01.030

[中图分类号] H315.9;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6)01-098-04

一、引言

在勒菲弗尔与苏珊·巴斯奈特合著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勒菲弗尔这样定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conceptual grid),是由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为人们所认同、接受的概念和态度构成的。它是读者、译者和文本亲密接触的必经之路^[1]。同时,他还把意识形态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纵,又是独立的个体,受到了个人意识形态的操纵。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不仅操纵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还操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由自主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写。

二、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的操纵

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于1988年,其英译本由美国的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于1995年首次出版发行。这本书在英语世界能得到出版的原因与美国读者对该类体裁作品的喜欢不无关系。小说英译者葛浩文在访谈中曾坦言,就美国读者而言,更偏爱三类小说,“一种是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2]。《天堂蒜薹之歌》讲述了一起因政府违约失职致使蒜农冲进政府大楼砸、抢、烧引发的恶性事件。书中的故事情节在美国读者眼里完全就是一部带有一定偏见性的政治小说,这正是让他们感兴趣的。与此同时,历史的推进及时代的演变成就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即自由、宽容、民主、公平及个人主义。书中描绘的农民的反抗精神正好与美国民众所推崇的为了追求民主、公平奋起反抗的精神不谋而合。因此,基于这样的读者需求,这部小说很快就被顺利发行。

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因素对译文的操纵体现

《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时间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在美国民众的印象中,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从鸦片战争之后就一直贫穷、落后。书中描绘的农民贫穷、卑微的生存状态正好符合美国民众对中国一贯的偏见。正是基于这种偏见,本书的开篇一段就被译者做了很大的改动。

(1) 尊一声众乡亲细听端详

张扣俺表一表人间天堂

肥沃的良田二十万亩

清清的喝水哗哗流淌

养育过美女俊男千千万

白汁儿蒜薹天下名扬

——天堂县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6]

Pray listen, my fellow villagers, to

Zhang Kou's tale of the mortal world and Paradise!

The nation's founder, Emperor Liu of the Great Han,

Commanded citizens of our county to plant garlic for tribute....

——from a ballad by Zhang Kou, Paradise County's blind minstrel^[7]

例(1)中,作为小说开场白的这段歌谣,其译文与原文大相径庭。且不说原文的押韵在译文中完全丧失,单就内容而言,译文也做了很大的改动。原文里说的是“过去”天堂县地饶水美,曾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人间天堂”。原著中作者并未交代这个“过去”的具体时间点。然而,在译文中,译者却擅自把这个时间点设定为距今很远的汉代。译者这么做是出于何种目的呢?前面讲到美国民众对现代中国一直抱有偏见。天堂蒜薹事件发生的年代正值

[投稿日期] 2016-01-20

[基金项目] 2015年度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项目编号JAS150533)

[作者简介] 陈佳(1983-),女,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在美国读者眼中,此时的中国跟富裕强盛是完全挂不上钩的,又怎可能出现“肥沃良田二十万”?在他们看来,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朝时期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强国。有史可据,造纸术的发明、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汉武帝时期奠定的中国今天的疆域版图,使得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科技强国;汉朝也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他们很有理由认为这个与古罗马帝国同期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只能那个时代才能赐予中国百姓丰衣足食,沃水良田及平安喜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故意将原文中描写百姓美好生活的时期改写为汉朝。只有通过这样的改写,才能让美国读者很自然地接受小说的内容,并认为书中所说的故事是真实可靠的。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 站住,不许动! 你这个拒捕的反革命! [6]12

Stand right there and don't move! You'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 by resisting arrest! [7]10

(3) 你到底入的是什么党?

你要是国民党就高枕安睡

你要是共产党就鸣鼓出堂 [6]155

As government protector, where is the kindness in your soul?

If you are a benighted official, go home and stay in bed;

If you are an upright steward, take charge and do some good.... [7]135

(4) 同志, 这也不是对付日本鬼子, 我还能骗你们? [6]164

Comrades, what do you take me for, a Nationalist spy? Do you really think I'd try to put something over on you? [7]142

(5) 你们这些小屁养的, 比他妈的国民党还厉害! [6]217

You bunch of cunt babies are worse than any son of a bitch I can think of! [7]193

前文提到美国读者偏爱政治性多一些的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外国的政治有着充分的了解。受到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民众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强国,很多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因此美国民众对他国的政治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不值得他们去深入了解和学习。甚至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 5000 年文明历史,在美国民众眼中也没

有获得应有的地位^[3]。更别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段恩怨历史,这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一片空白。因此,如果在翻译上述例子中的政治词汇时采取直译的策略,美国的读者会犹如坠入云里雾里。例(2)原文中“反革命”一词最初是指 1950 年 12 月——1951 年 10 月期间,在全中国展开的肃清国民党残留势力,清除间谍的革命运动。运动结束之后,这个词的意义被扩大化,在百姓口中它变成了一项漫天飞舞的“帽子”,任何违抗政府命令的人都可能被扣上这顶帽子,所以原文中警察将拒捕的蒜农高马称为“反革命”。如果将该词直译为“counter-revolution”,美国读者会感到震惊和困惑。因为对他们而言,革命通常意味着砍头流血的社会变革,而文中的高马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仅仅只是在追捕过程中逃跑了而已,连袭警的行为都没有。例(3)、(5)中,译者并不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语境对这几个“党”进行了意译。在译者看来,这两个词译出与否对文章的理解并无多大影响。虽然意译让原词的文化内涵消失殆尽,但却扫除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使他们能够轻松理解作者想要传递的意义。例(4)中译者将“日本鬼子”改译成了“Nationalist spy”,这点与美国读者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并无多大关系,译者这么处理多半是因为美国与日本的亲密合作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化干戈为玉帛,两国在经济、政治的交流频繁密集。得益于美国的扶持,日本经济迅速崛起^[4]。因而在美国民众眼中,日本人是他们最亲密的盟友,如果在译文中出现对日本的侮辱性词汇,美国读者多半会感到反感。因此,译者在这里舍近求远将其翻译成国民党间谍是有其政治考量的,毕竟译者坦言译语读者的反应才是他最看重的。当然,在例(5)的对话里“国民党”一词在原文中也出现了两次,这点也是译者这样处理“日本鬼子”这一词的另一个原因。

四、意识形态中的伦理因素对译文的操纵体现

前文提到,美国读者感兴趣的小说题材中有一类就是性爱描述多一点的作品。因此,为了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有时候会故意对小说做些修改使其带上一点情欲的色彩。这样的例子在葛译本中并不鲜见。

(6) 高马苦笑一声,说:“不是团长的老婆,是团长的小姨子,不过我可不爱她,我恨她,恨她们。” [6]21

Gao Ma sneered. “It wasn't his wife, it was his concubine. And I didn't love her. I hated her—I hated

them all.^{[7]19}

(7) 他在心里痛骂着自己: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假意跟她好,是想跟她姐夫沾光。^{[6]25}

You're despicable, he had cursed himself, pretending to be in love in order to enhance your prospects with her patron.^{[7]22}

例(6)例(7)中译者故意将小姨子改写成“情妇、妾”,将姐夫改写成“恩客”。原文中正常的家庭关系在译者的改写下变成了姘头姘妇的风流韵事。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大概在美国人眼里,当时的中国和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没什么两样,男子三妻四妾、拈花惹草也是常有的事。读者也总是津津乐道于乡村艳史之类的故事。

此外,美国社会对大家庭的观念要比中国人淡薄许多。因此,美国人对自己的亲戚没有叔、伯、姨、婶、姑、舅之分,也没有堂、表之说,父系母系的亲戚都是一样的称呼。凡是男性长辈统一尊称“uncle”,女性长辈统一尊称“aunt”。而中国的亲戚关系称谓不是一般的复杂。因此,对原文中的人物关系称谓,译者通常是采用易化的改写策略。

五、意识形态中的法制因素对译文的操纵体现

关于美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评论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教授有如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尽管美国人表面上轻浮傲慢,不尊重法律,而且总是不相信律师,但实质上是尊崇法治的。他们引以自豪的是,美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哪怕是最高级的官员都不能免受法律的管理”^[5]。因此,当原著中出现与美国民众法制意识相背而驰的内容时,译者就会采用“归化”的策略将其进行改写。

(8) “你以为我不敢去说!”高马怒冲冲地说,“今天晚上我就去说,你爹和你哥还敢打我不成!”^{[6]30}

“Don't think I won't,” he replied testily. “Tonight. And if your father and brothers don't like it, we'll settle it like men.”^{[7]26}

(9) “该打!”四婶恶狠狠地说,“打死你这个不正经的东西!”^{[6]57}

“You asked for it!” replied an enraged Fourth Aunt. “You're lucky we don't kill someone as immoral as you!”^{[7]51}

例(8)中,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是高马决定亲自登门请求金菊家人接纳他们恋情的内容。例(9)意欲表达金菊因拒绝和高马分手而被父亲殴打后,金菊母亲方四婶对此事的态度。根据中国的传统婚

恋习俗,子女从恋爱到婚姻基本都要受制于父母。金菊违背了父亲给她安排的婚姻而偷偷与高马私定终身,这样的做法在古老、守旧的中国农村社会里会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婚姻、恋爱自由,但是愚昧、陈腐的婚姻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广大百姓心中,偏僻落后的农村人心中更甚。在小说中,高马虽然是一个思想较为进步开化的年轻人,但是他明白,在那样的环境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不能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的,而反抗这种传统的婚姻习俗很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因此,他嘴上说金菊的家人不敢打他,其实心中却隐隐担忧这种可怕的后果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说这句话不过就是给自己壮壮胆罢了。而在美国社会,恋爱、婚姻是自由的,不管是任何人哪怕是至亲不顾法律约束违背他人意志侵犯他人人权的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孩子未成年时,父母不能暴力虐待孩子,否则会被剥夺监护权。子女成年后,父母更不能因为子女自由选择恋爱对象而对其施暴,否则他们很可能要面临被监禁的处罚。因此在例(9)中,原文中的“打死”是万万不能被美国读者所接受的,译者便用了反语来表达同样的内涵。而例(8)中,高马说的被方家父子随意殴打的情况也是不能被美国读者所理解的。自15世纪末,决斗的方式就广泛盛行于西方上流社会,尽管从17世纪早期起,决斗在欧洲通常已被法律禁止,但是在西方社会,仍被作为解决个人争端的有效方式而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西方国家的男性在发生争执时经常采取的解决方式就是进行单打独斗的对决,因此译者将其改成“像男人一样对决”正好符合西方主流社会对这种争执所认可的处理方式。

六、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操纵体现

原著中,虽然莫言笔下的四个主人公其整体形象是正面的,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四个主人公各有优缺点。高羊老实本分却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高马勇于反抗但做事冲动。金菊善良淳朴却愚昧傻气。方四婶可怜又自私。正是这些缺陷使得莫言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显得饱满而真实。但译者在翻译时,出于个人对个中人物的偏好或者美国大众对中国人的固有偏见,改写或者重塑了其中的人物形象。以如下例子为证。

(10) 他立刻猜到了他们要抓谁。高马,他们一定要捉高马!他鄙夷地看着秃头的村主任高金角,恨不得冲上去咬他一口。但转瞬间那怒气便消了,心里竟奇怪地盼望着警察多抓些人与自己做伴。如

果全村男人都被抓走,老婆的心就会平和,他想。
最好把高马抓到,蹲监狱也应该有个头领,而高马
正是最好的头领。^{[6]7}

Now he knew who they were after. It was Gao Ma;
it had to be Gao Ma. He glared at the balding village
boss, and would have bitten him if he could.^{[7]6}

例(10)描写的是高羊被警察抓到后的心理活动。划线部分在译文中只字未提。其实这部分正好是对高羊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补充描写。许多人也会如高羊或者阿Q那样,倒霉的时候都希望自己不是一个人,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人比自己更惨以求心理平衡。这样的人物形象可怜又可悲,但却是饱满、立体、真实的。而译者刻意将这段极其重要的描写省略不译,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弱者更弱,强势者更强势,这样才能更加凸显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冲突,从而使译本更能迎合美国读者对中国持有的偏见。

(11)四叔把滚烫的铜烟袋锅子抡起来,打在金菊头上。她听到头盖骨响了一声,一阵刺痛,一阵愤怒,一阵委屈,使她做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动作: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像撒娇的女孩子一样踢蹬着脚,把饭桌上的水碗都踢翻了。她哭叫着:“噢……你们打我……你们打我……”^{[6]56}

Fourth Uncle hit Jinjue on the head with the
red-hot bronze bowl of his pipe. She crumpled to the
ground, angered and humiliated. “Brute!” she shrieked.
“You hit me!”^{[7]51}

例(11)中原文莫言用了一些带有偏见色彩的句子写出了金菊做为农村妇女不可避免带点粗俗的本性。比如说“像撒娇的女孩子一样踢蹬着脚”等动作以及重复哭喊着“你们打我,你们打我……”,这些都是某些农村妇女长久以来在周遭人的影响下耳濡目染形成的遇事就撒泼的坏习惯。但是译者在

翻译时,出于个人对女主人公的同情和怜悯,故意将这些带有偏见的句子改写成中立的话语。这样改写后,美国读者就只能感受到金菊做为受害者可怜受委屈的一面,而无法窥探到金菊撒泼粗俗的一面。

七、结语

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译者的译介活动,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到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考量再到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译介活动中的每一阶段都有迹可循。因此,在对比分析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时,意识形态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综合考察社会意识形态及个人意识形态对译者译介活动所起的作用,对译者翻译成果的评价才能更客观、更准确。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 Lefevere, André, eds.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8.
- [2] 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6): 45-56.
- [3] 刘康.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研》之一[J]. 对外传播, 2011(8): 43-44.
- [4] 陈奉林. 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2): 11-15.
- [5] H. S. 康马杰著, 南木等译. 美国精神[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24.
- [6]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 [7] Goldblatt, Howard. *The Garlic Ballad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2.

[责任编辑 王云江]

Ideologically manipulated translation of *The Garlic Ballads*

CHEN Jia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anipulated translation of *The Garlic Balla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many an exampl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at there is abundant rewriting in the novel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basical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one. In conclusion, translators are always affected by ideological elements such as literary genre, or personal aesthetic and rewrite the original version,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 words: ideology; manipulation; *The Garlic Ballads*